



李 贤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阿英的文学之路始于以钱杏邨为名的《太阳月刊》,之后不断变化笔名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与编辑,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从1928年至1949年,他用过的笔名有十多个,阿英是1950年之后固定的署名。他在文学理论、文艺批评、戏剧创作、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已为人们熟知,实际上他在编辑整理方面也有突出贡献,除了编辑《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文献》等,对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图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是他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英的意义不仅在于以大量的创作参与了文学现场,实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还在于他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保留了大量史料。后来的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证明了较高的编辑能力和敏锐的学术预判力。

“文史一体”之下的编选

阿英文学活动的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早期的文学观表现为对“文学社会意义”的追求,对文学的认识以及他的创作都体现了“文史一体的价值观”,即“沿着文学与历史(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建构和进行价值取向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是把文学活动纳入到具体历史活动之中,以文学对现实的实际效用来评估他的价值”。他于1928年5月发表的《批评的建设》是这一价值观的充分体现,为了实践“批评的建设”中提出的理论主张,他在阅读大量作品的过程中,发现并编选了一些充分反映时代面貌和契合他文学观的代表性作

品。这一类型的编选受文学价值观的直接影响,关注文学如何表达宏大的时代主题,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阿英在1935年以前按这一标准的比较多,如署名钱谦吾编的《新文艺描写辞典(共三集)》《怎样研究新兴文学》《现代文学读本》等。在以阮无名为笔名主编的《现代名家随笔从选》中说到:“这部随笔编选的基准,是在强调在富有社会性的、实用的文字上面”。遵从的是“以文学对现实的实际效用来评估作品的价值”这一观念,把作品自身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内涵的社会作用相结合。从根本上来看,阿英的这一编选标准是对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作为职业的编辑在大众文化传播这一活动中的价值体现,“对他人的精神文化成果进行组织、编选、加工整理等创造性的优化处理,使其缔构成整体的、有系统的出版物物化形态。”出版物的物化形态是编者编辑思想的集中体现,文学价值则直接影响着文学编辑在组织、加工整理他人精神文化成果时的方向,阿英“文史一体”的文学价值观为方向的编选把时代的文学现场与历史经验以及两者的互动过程较为完备地记录下来,让我们在当下阅读时能够发现文学作品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同一个时代。既呈现了新文学发展的时代性、多样性,又以感性的文本书写着历史过程。

学术视角下的编选

阿英文学编辑视角的学术化与他的史料意识有关,史料意识是他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并贯穿整个学术生涯,这种史料意识在整理、编



阿 英

辑文学资料时表现的更为明显。如果说“文史一体的价值观”导向下的编选是他的个人偏爱,那么学术视角下的编选体现了他学者的严谨、客观。不虚荣不隐忍,不仅能注意到有影响的作家和主流作品,也能不因个人偏好择取不同观点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力求真实全面地记录新文学发展面貌。在他为不同作品所作的自序和后记中,读者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的史料意识。1928年以“钱杏邨”为名发起并编选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自序里,阿英写了编写此书目的是“使读者认识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关系和影响;引起读者的作家研究的兴趣;帮助读者去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一方面关注主流作品,一方面关注文学史的完整性以及研究者的兴趣。他每编著一本书都会有一个篇幅不限的宏观概述,《现代名剧精华》是他以魏如晦为名编选的作品集,在题记中写缘由是他作为学者的严谨:“由于作家自己的爱好,或思想转换的关系,常常地有一些作品被作家自

己摒诸集外,但这些作品无论在历史的意义上,抑艺术的观点上,却都有保存着的必要,尤其对于一些有历史癖的读者或戏剧研究者”。客观。不虚荣不隐忍,不仅能注意到有影响的作家和主流作品,也能不因个人偏好择取不同观点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力求真实全面地记录新文学发展面貌。在他为不同作品所作的自序和后记中,读者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的史料意识。1928年以“钱杏邨”为名发起并编选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自序里,阿英写了编写此书目的是“使读者认识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关系和影响;引起读者的作家研究的兴趣;帮助读者去了解这个时代的作家。”一方面关注主流作品,一方面关注文学史的完整性以及研究者的兴趣。他每编著一本书都会有一个篇幅不限的宏观概述,《现代名剧精华》是他以魏如晦为名编选的作品集,在题记中写缘由是他作为学者的严谨:“由于作家自己的爱好,或思想转换的关系,常常地有一些作品被作家自

阶段性的积累,史料意识是形成学科系统性的一种方法,也是编辑、出版者在编选出版时应该具备的工作方法。

文化视角下的编选

赫尔博斯说“时间是最根本之迷”,文学的谜面和谜底都在历史文化中,文学现象有时是历史现象,有时是文化现象。走进那些已成历史的文学作品离不开文化的观察,而文化是一个多层次、丰富的综合体,一个时代的文化影响一个时代的创作和学术研究方向。文学流派的出现和文学作品的编选既是文化影响下的主观选择,也是对文化的感性呈现。文化视角下的文学编选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解开时间之谜的方向,能够更好的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阿英的文化视角一方面受到“文史一体价值观”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赵家璧的影响,良友编辑赵家璧与阿英是好朋友并知道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以及收藏的书很丰富,在新文学大系未出版前,阿英就已致力于史料的整理出版,署名张若英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中说“要想在新近出版的文学史籍里,较活泼充实的看到一些当时的运动史实,和文献的片段,同样的也是难而又难”。这里已不仅是文学价值观的层面,也是要求文学史表现所处时代的文化,文学作品应该真实的反映参与时代发展。基于这样的观点,他编写文学史时尽可能“对每一事件,每一文献,都加上详细的说明,文学运动史事件段的叙述,一样的收进去。……这使读者可以看待他们的生活,以及何以要如此生活”。阿英以这样的方式记录文学、文化互动中具现的历史经验,

将文学现象视为文化现象并力求客观的考察。文化视角的编选有时效性,非“现场”的人不能感受其微妙处,从文学观到文化观,阿英参与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整个过程,他的感受和体验更为真实深刻。文学资料的编选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化的传播都有重要作用,阿英撰文从文学与文化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的价值,“即使暂时不能产生较优秀的文学史,资料索引一类书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着必要的,良友图书公司发行《中国新文学大系》其意义,可说是超过翻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从“中国文化史”的层面评价文学史料的意义。

阿英文学编辑思想的三个方面不是孤立的,是渐进的联系与共生发展,学术和文化的视角贯穿了他的整个编辑生涯。他在对现代文学发展的资料性文字整理中,能客观地、有意识的记录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在实际阅读体验中,从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再次强调编选资料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坚持“文史一体的文学价值观”,一方面关注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为读者、研究者提供了开阔的文学视野,为编辑提供了工作方法参照。史料的辑集体现了他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一些文学现象之谜。这些曾经代表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字因为他的整理编辑成了“史”的一部分,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相比,他作品的出版数量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加之他在资料整理中有力求反映一个时代文学发展全貌的史料意识,这为后来学人提供了大量可以借鉴的研究资料,这也表明了编辑思想在文学社会价值实现、学术史和学科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旅途随笔》的版本谱系

王 宇

1933年5月到7月间,巴金在朋友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游历了福建、香港、广东等地,在这次南方之旅中,巴金不仅收获了友谊,也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在旅行之余,巴金就沿途所见、所闻、所感陆续写成了系列散文,并相继在《读书》《大陆杂志》《东方杂志》《文学》《生活》《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

1934年初,生活书店为了应对国民党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文学》稿子要送审,且要署编者名字),决定编选一套丛书,即“创作文库”,这使得发表或未能发表在《文学》上的作家作品得以结集问世。该丛书以“选刊现代名家创作之专集,选集,包括长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批评”为宗旨。作为《文学》撰稿人的巴金,自然是该丛书的作者之一。

鉴于此,巴金把主要于1933年南方之旅中所写的散文以“旅途随笔”为名纳入“创作文库”,作为“创作文库”之五于1934年8月由生活书店出版,书前有作者写于1933年12月的《序》。初版本原拟收录28篇,但《捐税的故事》《海珠桥》《薛觉先》和《鬼棚尾》四篇“被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老翁用朱笔勾去,仅在日次中保留了篇名”,故而世的只有24篇。丛书主编傅东华为该书撰写了广告词,内容如下:

作者历来所作长短篇小说,早已脍炙人口。随集这还是第一部,是在去年漫游南北的半年里写成的。这是现实真实社会现象的写照,这是一个敏感的心灵的反映的记录。

初版本问世后的市场反响不错,按照巴金的说法,“这样的小书居然在一个月里面就销售了三千本,这是连我自己也料不到的事。”1934年10月,《旅途随笔》再版,利用这次再版之机,巴金把刚在《太白》第1卷第1期发表的一个“车夫”增收入《旅途随笔》,同时也修改了几处印刷错误和一些不当的字,并在书末增加了一篇《再版后记》。此后,《旅途随笔》又于1935年8月、1937年5月印行过三版、四版。

由于“一则不愿意看书店多亏本,二则不愿意让删改的书多流传”,巴金于1937年从生活书店收回了《旅途随笔》的版权,并在两年期满后将其交付愿意出版此书的开明书店。

借此机会,巴金对《旅途随笔》又做了一些修改。在篇目上补上了初版时被当局删掉的《海珠桥》《薛觉先》和《鬼棚尾》三篇,同时删掉了初版时的《亚丽安娜娜柏尔格》,共27篇。1939年4月,开明书店推出了新版《旅途随笔》,即为开明修订本。开明本书前除了初版时的《序》外,还增加了一篇《重排后记》,书的封面上下方增加了黑白色的波浪纹装饰,封底有开明书店的图标。开明本《旅途随笔》印行情况也不错,从1939年4月到1951年7月,一共发行了10个版本。

1949年12月,巴金的胞弟李采臣邀约他在上海的几个老同学李德洪、陆清源等集资兴办了一家专门从事于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的开明出版社。为了支持胞弟的事业,巴金不但兼任开明出版社的总编辑,而且把自己原在开明书店出版的《灭亡》《新生》《海的梦》《旅途随笔》等移至开明重印。由于时代、政治语境的变化,借此重印之机,巴金对原先的著作又进行了一些修订。建国后第一版《旅途随笔》于1953年6月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篇目上共收录了25篇,较开明本少了《西班牙的梦》和《薛觉先》2篇,删掉了《重排后记》,增加了《前记》。

1955年11月,开明出版社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合并于新文艺出版社,其出版社所出的图书自然也收归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旅途随笔》又获得了重版的机会,借此机会,巴金再次做了一些修改。新文艺本《旅途随笔》于1956年4月问世,正文前有《前记》和《序》,正文共收录了24篇,相比较开明本,删掉了《南国的梦》。按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物的惯例,扉页的背面的版权页上部增加了一个内容提要,内容如下:

这是一本游记,也是一本描写一九三三年中国社会情况的散文集。作者用流畅的文笔,奔放的热情,写出了他在南方和北方的见闻,也写出他的爱与憎。

50年代中期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编选了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等人的文集。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巴金文集》(共14卷),这是第一套系统地展现巴金“三十年文学工作的一点成绩”的文集,是巴金对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巴金于1957年到1961对入选文集的作品做了最为集中和最大规模的一次作品修改。《旅

途随笔》收入《巴金文集》第10卷,于1961年10月出版。文集本《旅途随笔》以新文艺本为主要参考版本,收录24篇,内附作者照片和手稿照片,巴金对收入的每篇作品又进行了一次修改。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巴金的创作热情再度燃起。1982年4月,由巴金参与编选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10卷本《巴金选集》,选录作品都是巴金认为能够反映他的思想艺术特色的作品,《旅途随笔》共选录12篇编入第8卷,分别是《香港的夜》《省港小轮船》《鸟的天堂》《机器的诗》《谈心会》《朋友》《一千三百元》《海珠桥》《鬼棚尾》《一个女郎》《扶梯边的喜剧》《平津道上》。编选过程中巴金仅对一些字词做了少许改动。

80年代初,尽管已有《巴金文集》和《巴金选集》,但读者和研究者仍需要更完备的巴金作品集。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计划编印《巴金全集》,并委托该社编辑、巴金的老朋友王仲晨(宇树基)与巴金联系。但巴金当时正集中精力于《随想录》的写作上,把编选任务全权委托给对方。王树基认真地做起了《巴金全集》的相关工作,1985年1月14日,巴金在致树基的信中说:“《巴金全集》的事我看只有一人关心,你在抓,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这究竟是我的事。那么明年我也来搞搞,不管大小,总得有点出力。”在巴金的参与下,1987年—1994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巴金全集》(26卷),收录巴金六十余年除译作作品以外的所有作品,《旅途随笔》收入第12卷,共选录了29篇,相比文集本多了《南国的梦》《西班牙的梦》《捐税的故事》《薛觉先》和《亚丽安娜·娜柏尔格》5篇。至此,《旅途随笔》终成全本。据《巴金全集》前的声明可知,原则上根据选集本排印,选集本收录的参照最后一次印刷的版本(即文集本),因此全集本《旅途随笔》是综合了文集本和选集本的一个版本。

新世纪以来,巴金的《旅途随笔》单行本及收录《旅途随笔》中部分篇目的散文随笔集不断出版。在《旅途随笔》的版本变迁中,初刊本到生活书店本(包括再版本),生活书店本到开明本修订本,开明本修订本到平明本,平明本到新文艺本,新文艺本到文集本,文集本到选集本,文集本(包括选集本)到全集本均有文本内容的修改以及篇目增删。巴金对《旅途随笔》的修改达8次之多。

结缘闽教共圆梦

周洪宇

在我的记忆里,福建教育出版社给我印象最早也最深的出版物,应该是20年前出版的那本华东师大翟葆奎与郑金洲两位先生主编、厚达1039页带有工具书性质的《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该书至今都被我列为博士生必读书目。后来该社约请翟、郑两位先生主编并陆续推出的煌煌数十册《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其眼界、胸襟和气魄更让我震撼并由衷钦佩,因为我知道这项工程不仅需要精心策划及雄厚的财力,更需要强大的专家队伍,需要眼力、笔力、耐力和定力,国内当时有好几个出版社都想做但最终都功亏一篑。从闽教社的出版物可以看出,社领导与编辑团队是一群立足教育,服务社会,开智启蒙,惠泽生命的教育出版人,而他们所结交的多是以梦为马、不忘初心、不负韶华、执着前行的教育理想主义者。

由于大家都有同一个梦想。所以,当2011年5月13日我在中山大学“教育与中国未来30人论坛”作完“建立教育特区,以区域突破带动教育综合改革”演讲,茶歇期间,成如辛先生过来与我打招呼,介绍自己是闽教社教育理论室主任,知道我专长陶行知与教育史和教育政策研究,热情邀请我为出版社编撰一套20世纪著名教育思想家陶行知论著丛书,并告知他们以往是如何尊重作者权益,处处为作者和读者着想,精心设计与编辑,努力扩大图书发行渠道后,我便毫不犹豫答应了下來,并立即组织队伍,部署研究工作。

这之后的故事就很简单了,与闽教社正式合作以来的七年里,我先后与华中团队成员为出版社组织编撰了《陶行知文库(教师读本)》3册,《教育生活史研究丛书》9册和《新人文教育丛书》4册。这其中,有我的《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陶行知教育名著精选》《陶行知教育名著论要》,我与刘训华的《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张建东的《历史的镜像——宋代学生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国昌的《生活的追忆——明清学校日常生活史》,李艳莉的《崇高与平凡——近代中国大学教师生活史研究》,刘京京的《理想与未来——民国时期

中学师生日常生活史研究》,我的《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狄口常三郎的生活史》,刘训华的《奋斗的青春——大格局中的中国大学生生活叙事》,蓝日模的《一位民族地区校长在学校文化重塑中成长》和鲍成中的《适应与超越——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以及我与鲍成中的《第三次教育革命论》、宋毅骥的《教育转型——走向创业型大学》、易凌云的《互联网与教育变革》、徐莉的《中国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改革试点研究》等,已经出版的这些著作,都是我中华团队多年研究的课题成果,大多是精心撰写、研究深入的博士毕业论文。教育生活史的系列著作,均为开辟新领域的首创之作。第三次教育革命论、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等,更是力求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在实践上有所创新之作。还有一批已经列入《新人文教育丛书》计划的专著正在撰写之中,预计不久也将与读者见面。

从已经出版的这些图书发行情况来看,不少都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销售状况也不错,据反映,《陶行知教育名著精选》《陶行知教育名著论要》《陶行知生活教育导读》《平凡的伟大——教育家陶行知、杨东莼、狄口常三郎的生活史》《适应与超越——教育家成长规律研究》《崇高与平凡——近代中国大学教师生活史研究》等书出版几年来均已重印多次,有的印数已达数万册。说实话,在如今市场导向严重、消费主义盛行、快餐文化当道的年头,严肃的学术著作可以发行到数万册,确实不容易。这也算是多少发挥了学术成果的社会功能吧。我深知,这里面,出版社的精心编辑与用心销售,同样功不可没。

由于这些缘故,几年来,我们双方合作愉快,一有新选题,我常常最先想到的就是闽教社等几个出版社。在与闽教社的交往中,我能深深感受到出版社对作者的尊重、厚待与支持。闽教社实行的兼顾作者与出版双方权益的稿费制度尤其是阶梯式版税制,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现在各家出版社都已注重这项工作,不是双方合作愉快的最主要原因。我这里想说的是社

领导和编辑们对作者的倾力支持与隆情高谊。

2014年10月下旬我应邀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参加中国第一个在类获哲学博士学位(教育学)者郭秉哲先生一百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并与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院士一起去联合国会议中心介绍中国教育改革近况。会前两个月,我打电话给知辛,询问不知出版社能否帮忙将拙著《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赶印出来,以便带到会上送给与会学者、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交流,我原以为时间太紧,很难完成,谁知他二话不说,马上组织力量抓紧编排,亲自协调各方,终于赶在我出国前三天寄到我手上,顺利开展学术交流。

还有一年,大约是2015年吧,我到福建干干。黄旭社长得知后,嘱咐知辛务必邀请我到出版社实地考察一番。我与黄社长神交已久,早已久仰他的出版家大名,于是公务之余,欣然答应。记得我当日下午黄旭、知辛、丁毅等人陪同我参观了黄旭社长小而精致的办公室和社里在临海两层裙楼新开的大梦书局。书局两侧绿荫掩映,环境清幽,室内陈设高雅,书丛错落有致,刚上架的新书香沁脾,真是一方读书的好去处。众人一块品茶赏书,谈笑风生。夜色临近,又陪我参观福州夜景中的历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并与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一道在文儒坊设宴款待。在昔日的状元匾匾下,南、黄等东道主,说古道今,侃侃而谈,美食与文化交融,传统与现代共融。在品尝福建地方名吃的时候,加深了我对福州历史文化与名人的了解。回想起来,此情此景,仿佛就在昨日。

今日的中国已然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也意味着教育人和出版人的新担当与新作为。闽教社坐落于福州美丽的梦山路,“梦山”,“梦山”,教育人和出版人的“有梦之山”抑或“圆梦之山”,它或许寄寓着历史赋予的更大责任与更多期待?作为多年的朋友,我愿意与有着共同梦想的闽教社同仁,继续前行在教育理想的圆梦之路上。

“我与福建教育出版社” 立足教育 服务社会
——60周年纪念专题—— 开智启蒙 惠泽生命